

法国汉学界对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的研究(上)

耿 昇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明末清初的16—18世纪,是中西两种文化首次撞击的时代。这次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流媒介,是以入华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他们无论是在中学西渐方面,还是在西学东渐领域中,都做了许多有益的、他人无法取代的工作。他们在华的传教事业基本上是失败的,或者说是收效甚微,但他们在中西文化(哲学、史学、经济、伦理、政治、语言文字、科学技术等)交流方面成绩斐然。他们在中学西渐方面取得的成绩比在西学东渐方面更大。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课题,法国汉学界在该领域中始终居领先地位。本文对法国汉学界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了鸟瞰式评介。

[关键词]入华耶稣会士;中西文化交流;法国汉学界;明末清初

[作者简介]耿 昇(1946—),男,河北省阜平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法国文学艺术勋章获得者,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和中亚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3)04-0173-10 **[收稿日期]**2003-04-20

对明末清初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的研究,始终是法国汉学界的一大重镇,人才济济,成果丰硕,在欧美国家中居领先地位。本文拟就法国在该领域中的科研成果略作介绍,时间仅限于16—18世纪,范围只涉及入华耶稣会士。对于清代中后期以及其他修会的传教士,尤其是新教传教士的在华活动,由于已不属于“首次撞击”范畴,在此从略。

法国在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当属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谢和耐(Jacques Gernet, 1921—),他也是国际汉学界从事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撞击、交流和比较研究的一大权威。1982年,谢和耐利用利玛窦入华400周年(1582—1982)之契机,推出了《中国和基督教》一书。此书先后被译成东西方的十余种文字(英、德、意、西、葡、瑞典、波兰、日、韩、荷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了笔者的中译本),从而享誉海内外。在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明清鼎革之际中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政治、历史、文化、社会、思想意识、世界观和伦理诸方面的殊同后认为,中国可以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交流与接触;某些中国人,甚至是某些中国文人士大夫和精英分子,也可以归化成为基督徒;基督一天主教可以作为中西文化撞击交流的一条主要渠道,中西双方可以在真正了解或误解的基础上,达成某种程度的表面共识。但是,中国永远不可能被“彻底基督教化”,也

就是说,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绝对不可能像西方或世界其他某些国家一样成为一个基督一天主教国家。中国始终在强烈地坚持自己那悠久的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儒家文化虽有开放性和兼容性,但其“同化性”却表现得更为强烈且成果更丰。先后传入中国的各种文化(佛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最终都被严重同化——“本土化”或“儒家化”了。耶稣会士们采纳了利玛窦等首倡并亲自试验实施的那种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适应政策”。因此,基督教文化在中国不可避免会“本土化”。在中西于明清之际的首次文化撞击中,西方所关心的是向中国传播基督宗教及其文化,而中国最感兴趣的却是西方相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种文化交流实为一种直面“撞击”,双方各怀心计,各有打算。

该书的出版,正值西方学术界大规模纪念利玛窦入华400周年的高潮中,引起的震动格外强烈。从总体上来讲,它在西方学术界的汉学家中,赢得了很高的支持率、很大的荣誉和普遍的好评,特别是荷兰的许理和(Erik Zürcher)、丹麦的伦伯格(K. Lundbaek)、德国的柯兰妮(Gludia von Collani)、澳大利亚的保尔·鲁尔(Paul Rule)和法国的鄂法兰(Francois Aubin)等,他们基本上都赞成和肯定谢和耐的观点。但在西方神学界的汉学家中,此书也招致了不少激烈的批评。由神学界汉学家们主宰的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最初几届曾邀请谢和耐去主持大会。自此书出版后,不再邀请他与会了。反对最激烈者有美国旧金山大学的马爱德

(Edward L. Malatesta)、普林斯顿大学的魏若望(John W. Witek)和法国利氏学社的甘易逢(Yves Raquin)、顾从义(Claude Larre)等人。这些神甫们出于其“天下归主”的坚定信念,当然会对谢和耐的观点提出异议和非难。为了捍卫自己的立场,谢和耐又分别于1988年在《天主教与亚洲社会》的文集中发表了《中国17世纪的基督教本土化问题》、1993年在《欧洲在中国》的文集中发表了《中欧交流中的时空、科学与宗教》、1998年在《中国研究》中发表了《再论中欧早期的文化交流》等具有雄辩力的论文,继续发挥自己在《中国和基督教》一书中提出的许多论点。他再次强调,中国爱国的官吏和士大夫们都注意严肃伦理和正统精神,关心为国效力和为民造福。入华耶稣会士们从事行政管理、韬略、兵器、治水、农业或手工业生产的机器之研究和介绍,同时也主张严肃的伦理,注重实用科学技术,主张恢复正统,因此,在中国文化精英与传教士之间,便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相互误解的基础上达成了表面的共识。基督教也通过“适应”政策而在中国找到了立足点和支撑点。但中西世界观或时空观相差甚殊:西方继将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传统结合起来之后,使感性与理性之间出现了原则性差异;对于创世和支配世界的上帝之信仰,是至高无上而不变的原理。基督教在西方利用了斯多葛学说和新柏拉图主义所提供的內容,在有关父子圣体共存论、基督的人性和神性、亚里士多德主义和烦琐哲学、由文艺复兴和新教改革在天主教徒中引起的反响中,痛苦而缓慢地摆脱了黑暗的中世纪而进入近代。中国的时空观是自《易经》和印度佛教继承而来的,它在中国产生了一种不稳定性,即无限宇宙的永久变化之思想。中国对于只有感性知识的一切都明显地不信任,不了解宗教权与世俗权之间的基本区别。所以,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时的混乱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从文化角度来讲,西方列强企图让中国放弃和毁灭其遗产而全盘西化,也是完全行不通的。

谢和耐于1972年初版并分别于1988年和1990年再版的《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笔者的中译本)一书中,也设立了专门的章节论述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问题。他指出,耶稣会士们在天文学、算学和地图学等领域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他们是中国算学于17—18世纪复兴的主要促进人。在诸如农业和手工业那样的实学领域中,他们也产生过影响。但西方在17世纪时,各方面并不比中国占优势,中西在这个时代有许多相互学习的机遇和内容。例如,当时中国的传统天文学要比利玛窦传入的天文学更为“近代”一些,利氏不了解欧洲天文学的最新成果,依然始终都忠于托勒密的天文学体系,而托

氏理论又与中国人的思想和习惯互相矛盾。

1979年,谢和耐还在《第欧根尼》(Diogène)杂志第105期发表了《17世纪基督徒与中国人世界观之比较》一文,指出,在入华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科学问题上,要避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把入华耶稣会士们传入中国的科学看得比它的实际情况要先进得多。二是认为中国一切都要向西方学习,把传教士们的布教活动在中国所引起的批评与沉默都归咎于中国人的愚昧、仇外和狭隘地坚持民族传统诸因素。欧洲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即误认为起源于西方的定律和原理都是最高明的。欧洲科学从16世纪末开始传入中国,这主要不应归功于传教士们的积极性,而是取决于中国人自己的需要,是中国人自动地对西学表现出了好奇与兴趣。因为传教士们并不是为了讲授欧洲数学和天文学才远涉重洋而到达中国的。

在五十多年的汉学生涯中,谢和耐虽然涉猎广泛,但基本上是以中国社会史这个大学科为中心而展开的。在关注明清之际的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大变迁的同步化时,他发现入华耶稣会士正好适逢其时地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与撞击的媒介。因此,他始终不间断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屡有新作发表。1994年,他的汉学论文集《中国的智慧》正式出版。在书中收入的25篇论文中,有关明末清初耶稣会士问题的专题论文共有6篇,分别从哲学、宗教、政治和观念诸方面论述了16—18世纪入华耶稣会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的贡献、遇到的困难和阻力、造成的撞击、负面和正面影响等问题。

二

法国学术界在该领域中的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汉学家,是原任教于设在敦刻尔克的海滨大学和现就职于巴黎第8大学的迪代伊(Jean-Pierre Duteil, 1958—)教授。他于1994年出版了其博士论文《上帝的使命,入华耶稣会士的作用》之巨著。全书共分五篇十四章,充分利用了拉丁、葡、法、意、德、英和荷兰等文字的文献,深入论述了从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Yasuy Javier, 1506—1552)1552年客死于中国广东上川岛,到耶稣会于1774年被解散之间的二百二十多年间,入华耶稣会士们在传播宗教和中西文化交流中曾起过的作用与扮演过的角色。该书具有三大突出特点:其一是书中对于中国礼仪之争所经历的过程作了详细阐述。这场争论的起因是在基督教中国传教区中孕育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念,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是应该采取在殖民地所实施那种“彻底摧毁”政策,还是运用由教祖依纳爵·罗耀拉(Ignace Loyola, 1491—1556)于其教

谕中提倡、并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由利玛窦和范礼安等亲自实施的“适应”政策。后一种政策虽然获得了某种成功,但却受到了其他修会和教廷的抨击,甚至在耶稣会内部也有异议。其二是突出了葡萄牙入华耶稣会士所起的重要作用。迪代伊经过认真而又仔细的探讨,统计出葡萄牙籍入华耶稣会士于16世纪末是113人,1600—1650年是94人,1650—1700年是81人,18世纪为108人。除了在18世纪法国以159人而超过葡萄牙的94人之外,葡萄牙在人数上始终占据优势,而且他们在文化、贸易和政治方面也都作出过不平凡的业绩。其三是资料极其丰富。作者共参阅了近八百名人华耶稣会士的档案、书简、年度报告,特别是他们有关中国和远东的著作。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作者不如谢和耐那样精通中文、熟悉中文史料和了解中国的国情,故当他从中国一方着眼论述时,明显有些难以驾驭。在第四和第五编中,作者从军事、外交、官制、科举、司法、婚姻、科学史、天文学、纪年学、语言学、舆地学、度量衡、医学、动植物学诸领域着眼,分门别类地论述了耶稣会士们在中西双向交流中所起的桥梁和媒介作用。并在结论中指出,在18世纪上半叶,中国在莱布尼茨、马勒伯朗士、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哲学体系形成中曾起过重要作用。自1750年之后,无论是卢梭、狄德罗还是布丰,他们受中国的影响远不如先前那样明显了。欧洲根据耶稣会士们的书简和著述,“重造”了一种中国形象。在旧制度时期(法国1789年之前的王朝)的最后几年间,人们理解了中欧之间的差异性超过了其相似性,西方人更多地不再是关注如何使中国人归化的事业了。在18—19世纪的世纪之交,中欧之间的互不理解占据了突出地位。无论如何,欧洲的宗教信息是与科学同时传播的,传教士们只提供了一个有限时代的中国形象。

迪代伊对于葡萄牙入华耶稣会士情有独钟。1996年,他又推出了葡萄牙入华耶稣会士曾德昭(Avarez Semedo, 1585—1658)于1642年出版的《中华大帝国通史》的最新译注本。曾德昭的汉名1620年之前叫谢务禄,1613年来华,后与高一志(Alfonso Vagnone, 南京教案之前的汉名是王甫肃)一并于1616年受沈淮策动的南京教案牵连,被放逐于澳门。1621年,他又以曾德昭的名字返回江西,并出任传教区的中国副省长。曾氏在华共生活22年,是利玛窦“适应”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和忠诚实施者。他坚信,要想使中国归化,须首先使中国皇帝及其有权势的亲信和心腹归化,然后才能造成“望风而归”的局面,以图在中国制造一个新的“君士坦丁大帝”。因为“君士坦丁大帝”(约280—337)是使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奠基人。所以,曾德昭于

1642年出版了《中华大帝国通史》一书。此书虽美其名曰“通史”,事实上却是一部晚明史。该书原文用葡文所撰,最早却是以卡斯蒂利亚文(中部西班牙文)出版,后来被译为意大利文、法文和英文,但其原著始终未以葡文发表。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澳门出版的葡文本仍是从其他语言翻译而来的。该书基本上是以利玛窦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为模式而写成。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中国社会的概览,描述了中国的制度、风俗与日常生活,它证明了17世纪的西洋人已对中国有了一种明确的概念,它们形成了西方对中华世界的最早总结。第二部分论述了中国的宗教事态,重点是自利玛窦入华后的中国传教史。书中对于明朝皇帝、皇官及各级官府的记载,尤为详尽和珍贵。

1999年,迪代伊又推出了法国赴华和越南北部的耶稣会士罗历山(Alexandre de Rhodes, 1593—1660)的《交州王国史》一书的最新注释本。罗历山于1624—1645年间先后于广东、澳门和北部湾(交州)传教,但主要活动于越南北部,是越南文字拉丁化的设计人。《交州王国史》一书是在他返回欧洲后于1650年用意大利文发表的,于1651年被译成法文,1652年又被译为拉丁文。他的其余7部有关中国、越南和远东的著作,也先后于1650—1653年间刊行。《交州王国史》一书共分两卷八十二章,对于缺乏详细文字记载历史的交州显得格外珍稀。它是西方研究17世纪中国南部、北部湾和越南的少有专门著作之一。

原为巴黎大学比较文学讲座的主持人,学贯西中的法国著名作家、政治评论家和社会学教授安田朴(R. Etiemble, 1909—2001),也是法国从事中西文化交流与比较的一代宗师。1965年,他就推出了《入华耶稣会士与礼仪之争》一书,成为法国60年代研究明末清初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的重要历史性和理论性著作。该书以原始历史文献为基础,对于萦绕中西关系两个多世纪的中国礼仪之争事件的缘起、发展过程、后果及其影响,均作了颇有见地的探索。作者从这场在欧洲爆发的以中国为对象的而中国人自己却一无所知的大争论中,得出了一种基本结论——“宽容的哲学中国”和“不宽容的基督教西方”。礼仪之争的结果是由于控辩双方的激烈争论,一方面是使中西文化交流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极大的撞击,使之受到很大的阻力和诸多的障碍;另一方面又在西方促产生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论著,激起了西方17—18世纪的一场“中国热”风潮,使西方哲学家们得以利用中国形象而向守旧派、“无耻行为”和教权挑战。

安田朴在巴黎大学主持中西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讲座多年,其讲义被编成了一部《哲学的东方》(与

“基督教的西方”相对应), 最终于 1988 年和 1989 年分上下卷出版了《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 2000 年出版了笔者的中译本)。在这部洋洋大观的两卷五十四章论著中, 从第十三章开始便完全是以入华耶稣会士作为主线了。作者主要是追述欧洲从 16—18 世纪的“中国热”风潮到鸦片战争之前的“仇华”过程。作者认为, “中国热”风潮之所以兴起, 完全是以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的误解和本国需要为基础的, 与西方殖民列强日益强盛和中国国势日渐衰落密切相关。书中特别指出, 欧洲大思想家们更多的关心之处, 是利用中国为他们的政治哲学增光或作为陪衬, 其意义不在于纯学术方面。他们对中国所作的评价, 同样也取决于他们捍卫的论点和立场之需要, 而并不是入华耶稣会士们勾勒出的中国真实形象。入华耶稣会士们自己的言论也受到了约束, 他们一方面要维护其身负的福音化职责, 另一方面又致力于研究由发现中国而在欧洲激起的冲击波。拉摩特·勒瓦耶、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伏尔泰、达尔让斯、孟德斯鸠、魁奈和重农学派(以杜尔哥为代表), 都深受中国的影响。他们对于西方接受中国文化起过重要的作用。

三

在入华耶稣会士中, 还包括一批宫廷画家, 或者说中国皇帝的御用洋画师。他们将西洋画传入中国并向欧洲介绍中国画, 在中西绘画和艺术交流中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法国研究入华耶稣会士画师们的专家, 主要是巴黎艺术博物馆的伯德莱(Michel Beurdeley)教授。他于 1971 年出版了《中国宫廷中的耶稣会士画家郎世宁》一书。书中首先介绍了意大利入华耶稣会士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的生平及其在华活动的历史; 接着又分门别类地介绍了郎世宁作为建筑艺术家而在建筑圆明园中作出的贡献、他奉敕命制作的 16 幅铜版画《乾隆皇帝得胜图》(表现乾隆皇帝平定准噶尔部及大小和卓木叛乱的武功图)、作为宗教画家的郎世宁(南堂的宗教透视图)、作为人物肖像画家的郎世宁(乾隆皇帝及其嫔妃们的画像)和作为山水动物画家的郎世宁(百骏图、飞禽和山水花卉画); 其后又论述了郎世宁与当时的中国画家(年希尧、张照、于敏中、钱陈群、钱载、沈德潜、唐岱、邹一桂、吴历等)的交往关系与学术磋商; 最后是介绍中国历代画家、文人、辞书、书籍和报刊杂志对郎世宁的评价。书中发表的郎世宁书简及其主要绘画, 现在分别藏于法国、意大利、美国、日本以及中国北京、承德、台北等地的美术馆、博物馆和图书馆。作者认为, 入华耶稣会士画家们所追求的是传播其宗教信仰, 而不是将其文化强加于

人。入华传教士们清楚地知道, 他们将被视为中国皇帝的臣民并且很难再返回欧洲故里, 很可能会客死于异国他乡, 所以他们极力学习并适应中国文化。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入华耶稣会士画家们才在保持其宗教信仰的同时, 又采纳了中国的绘画技术; 当然, 也有诸如吴历那样的中国传统文人和画家, 在保持其中国绘画传统艺术的同时, 却变成了一位天主教司铎。但传教士们对于中国画的论著, 也有误解和偏见。他们从未将任何中国绘画的汉文论著译成西洋文字或寄往欧洲, 而只是热衷于撰写有关历史、文学、音乐、瓷器等方面的论著。

1997 年, 伯德莱又出版了一部《18 世纪的入华耶稣会士画家》(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2 年出版了笔者的中译本)的新作。全书图文并茂, 除了十二章文字记述外, 同时还收入了入华耶稣会士郎世宁、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 1702—1768)、艾启蒙(Ignace Sichelbarth, 1708—1780)、蒋友仁(Michel Benot, 1715—1774)以及遣使会士德理格(Todorico Pedrini)、奥古斯定会士安泰(安若望, Jean Damascene)特别是在康乾皇帝宫中充任御画师们的作品。书中所刊载的一百三十多幅绘画, 重点是讲述郎世宁与王致诚在宫中作画、耶稣会士们与大收藏家乾隆合作、热河木兰围场秋狝图、铜版画(乾隆皇帝得胜图)的制作、建筑圆明园的艺术喷泉(大水法)与西洋楼、耶稣会士们的山水花鸟画与人物画。作者在书中讲到, 耶稣会被解散之后, 仍有几位原耶稣会士留在乾隆末年的宫中。这其中既包括意大利籍入华耶稣会士潘廷璋(Giuseppe Panzani, 1734—1812), 他以乾隆皇帝的画像作为《中国杂纂》的卷首插图而名震法国; 也有贺清泰(Louis-Antoine de Poirot, 1735—1813)和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等。作者特别研究了在雍乾时代(1723—1795)耶稣会士们作为瓷器装饰图案而绘制的浅灰单色画, 尤其是法国入华耶稣会士殷弘绪(Francois-Xavier d'Entrecolles, 1664—1741)在瓷都江西景德镇的作品。这批绘画证明, 18 世纪的中国绝不是在西方所流传的那种负面形象——僵化、鄙视经商和利润或国际贸易、拒绝外国最新创造发明等。总而言之, 由于这批入华画家耶稣会士主要是生活在康、雍、乾盛世时代, 所以, 他们的绘画活动形成了中西艺术交流史上的一次高潮, 成为中西艺术文化首次撞击的明证。

中国艺术图案传向欧洲, 也要归功于入华耶稣会士们。法国 17—18 世纪的博韦壁毯中就出现了以中国图案作为背景装饰的技艺, 欧洲瓷器中也出现了中国式的装饰图案。欧洲经销商还向中国瓷窑提供图案, 以供在中国生产定向的“订货瓷器”使用。法国圣

迪埃(Saint-Dié)博物馆于1981—1982年间举办了一次“1765—1830年法国东部瓷器制造中的中国式装饰图案”展览,并为这次展览出版了一本精美的图文并茂的书。书中特别论述了中国装饰图案风靡欧洲的全过程:法国17世纪的异国情调风格绘画、1650—1800年欧洲的“中国式”装饰图案、1650—1830年欧洲采用中国装饰图案的实例统计表、中国装饰图案的断代等,特别是斯特拉斯堡、尼德维耶、阿佩里等地区的中国式图案以及法国东部瓷器制作坊中的“中国式”图案尤为珍贵。

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hieu Ripa, 1682—1745)虽不属于耶稣会,但他在华期间与耶稣会士们交往甚密,关系甚笃,所以在此也略作介绍。马国贤于1710年1月2日来到澳门,1710—1723年在清宫为康熙帝做御画师、版画家和地图家,曾著有《清宫十三年》的回忆录。法国学者柯孟德(Christophe Commentale)于1983年在台湾欧语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法文译注本《马国贤——中国宫廷中的画家、版画家和传教士》。柯孟德还在法国和日本发表过多篇有关马国贤的论文。作者认为,马国贤实际上是继承了利玛窦、艾儒略及利氏弟子倪一诚(Jacques Niva)和游文辉(Emmanuel Pereira)等传教士画家,特别是宫廷洋画家的世系。马国贤之前的画家耶稣会士们形成了艺术家传教士入华的“第一次浪潮”,以纯传教为目的而关注绘画。“第二次浪潮”则以耶稣会士王致诚和郎世宁为代表,于宫中绘画,同时也注重版画。马国贤正处于这两次浪潮的转折点上。在第二次浪潮中,他们的代表作是1769—1775年的一组版画《中国皇帝得胜图》(《乾隆皇帝得胜图》),本是庆祝清朝皇帝之武功的。传教士们在此期间,既要必须服从皇帝的要求,又要从事使中国人归化的事业。马国贤用绘画来表现一切内容,但他更喜欢的是人物画而不是风景画。马氏培养了许多中国弟子,如直隶的殷若望、谷文耀、黄巴桐和江苏的吴露爵等,而表现承德避暑山庄三十六景的铜版画则为其版画代表作。马国贤的《清宫十三年》一书,记述了他在华的全部活动。

在华耶稣会士与中西艺术交流与撞击问题上,法国学者对于1747—1768年间乾隆皇帝借助入华耶稣会士在圆明园中建造西洋楼和长春园一事作了大量研究,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法国汉学家毕梅雪(Michel-Pirazzoli-tS'erstevens)主持了一个专门研究组,重点研究西洋楼和御花园的建筑年代、建筑技术及其用途,考证1783年的西洋楼版画和其他“老照片”、建筑复原、植物鉴定与西洋模式。他们近年来已发表了一大批研究成果,诸如杜兰和若纳塘的《乾隆皇帝的京西休闲地》

(1987年)、毕梅雪的《西洋楼的历史和传说》(1987年)、《郎世宁与乾隆皇帝的西洋楼》(1989年)、杜兰和萨里耶的《中国皇帝西洋楼版画》(1993年)、蒂里耶的《从1860—1940年的照片看圆明园的西洋楼》(1990年)、杜德兰的《圆明园西洋楼复原》、热耐斯特的《圆明园的西洋楼及御花园中的植物》(1994年)、德罗盖的《乾隆皇帝的西洋楼及其意大利原型》(1994年)等。

入华耶稣会士们在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领域中也从事过许多活动。从1984年起,法国汉学界便在谢和耐的推动下,组建了一个中国科技史研究小组。其研究重点是中国的数学、天文学、生物学、动植物学和医学等,同时也包括化学、烹饪学和语言学。因为今天的人们再不能像裴化行那样只是对“耶稣会士们的科学贡献”作简单统计了。他们将重点放在理解中国学者根据引进的内容和自己固有的传统,进而形成某些新的科学体系、西方科学改变中国人的科学观念等问题上了。法国在该领域中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詹嘉玲(Catherine Jami)和马若安(Jean-Claude Martzloff)教授。詹嘉玲女士于1990年出版了其博士论文《三角速算法与精确圆周率:中国数学的传统与西方的贡献》。作者根据她于1985年在梵蒂冈图书馆找到的法国入华耶稣会士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quet, 1665—1741)为康熙皇帝撰写的一批几何学与天文学著作手稿,重点论述了促使中国接受欧洲科学的诸因素。她尽力探讨数学观念传入中国的方式,特别是法国耶稣会士们向康熙皇帝授课的方式,进一步确定数学在文化生活中所占的地位。詹嘉玲还于1986年出版过一部《傅圣泽和中国科学的近代化:阿尔热巴拉新法》(“阿尔热巴拉”系法文algebre的对音,即代数学)。马若安先在1981年出版了《梅文鼎的数学著作研究》,1987年又出版了《中国数学史》。书中都涉及了17—18世纪西方科学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科学发展的促进诸问题。它们使欧洲数学与天文学传入中国的年代进一步精确了,同时,也突出了中欧学者在这些科学领域中的独自工作与互相影响问题。如著名数学家梅文鼎和曾于乾隆时代任钦天监监正的蒙古人明安图(Miangat)都直接或间接地触及过西方数学与天文学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他们各自的科学体系。

四

法国神学界在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研究领域的汉学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原入华耶稣会士荣振华(Joseph Dehergne, 1903—1951)神甫。1936—1951年间,他作为耶稣会士在北京和上海度过了十五个春秋,主要是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法语、哲学,并编辑学刊和著

书立说。朝鲜战争爆发后,1951年他回到了法国,从此便在尚蒂伊耶稣会档案馆从事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并于1965年通过了其国家级博士论文《贝尔坦的两名中国人:1764年对中国工业的调查和法中技术合作的开端》。贝尔坦于1753—1780年间先后任法国省长、警察总监、税务稽核总长、国务部长和代理外长等职,与曾任法国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法国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杜尔哥(A. R. Jacques Turgot, 1727—1781)等人,向由耶稣会士卜日昇(Jean Babonier, 1678—1752)派往法国的中国修士高类思(Aloys Kao)和回国述职的杨德望(Etienne Yang)开列调查提纲,要求他们对中国的工业、科学技术和中国其他国情进行调查,并将资料陆续寄回法国。荣振华的这部长达八百多页的打字影印本博士论文,正是论述这段历史的。由于有关这段历史的档案大都收藏在耶稣会档案馆,所以,惟有他这样的耶稣会档案馆的研究人员,才有可能撰写这种具有资料特征的综合著作。

荣振华的第二部有关该学科的著作,是他于1973年出版的工具书《1552—1800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了笔者的中译本)。书中介绍了自1552年死于上川岛的耶稣会教祖方济各·沙勿略到18世纪末(1800年)在华的957名耶稣会士(包括少量归化的中国从教人员,特别是澳门人)的列传。每篇小传中都详细列举了传主的诞生、受洗、晋铎、出发赴华、莅华、汉名、在华活动期、主要活动和职务、逝世的时间,同时还介绍了世界范围内直到当时为止有关传主的研究论著目录。书后所附的各种资料更有参考价值:它包括入华耶稣会士中历任明清宫中钦天监正者、康熙大地图和《乾隆皇帝得胜图》的测绘与制作者、参与北京观象台建筑设计和制造其仪器者、在明清宫中为宦者、历任中国副省长和传教区总会长者、历任传教区司库和巡按使者。此外,还有历次教案统计表、入华耶稣会士们的汉名汉姓与教名统计表、不同时代与不同国家的传教士统计等。总而言之,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工具书。

荣振华的第三部有关著作,是他于1984年与澳大利亚国立高等教育学院教授、中国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研究专家李渡南(Donald Daniel Leislle)联袂出版的《中国的犹太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笔者的中译本)一书。自从利玛窦于1605年在北京会见河南开封的犹太举子艾田之后,入华耶稣会士们便自信,中国自周代以来就存在着上帝子民和基督教信仰(有关开封犹太人的清康熙碑中有“教起天竺,周时始传于中国”的记载)。从此,基督教西方知道了在中国开封存在着一个犹太人的社团。这一发现被称为“中国民

族史上的一大奇迹”。此外,由于西方基督教世界始终怀疑犹太教徒篡改过现今传世的《圣经》文本,所以,他们绞尽脑汁地在寻求最原始的,也就是未被犹太教徒篡改之前的《圣经》稿本。他们也将这种希望寄托在中国开封的犹太人身上。西方宗教界、学术界、犹太人社团,甚至政界,都竭力鼓励对开封犹太人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是寻找《圣经》的原始文本。入华耶稣会士们由此发动了持续两个多世纪的调查研究活动,搜集有关开封犹太人的起源、姓氏、信仰、礼拜、经书、拉比(掌教)的选择、饮食习惯、仕途、犹太教会堂、改宗信仰伊斯兰教的过程等方面的资料,然后写成书简或报告,寄回西方。其中,有许多资料始终未刊。该书中共发表了意大利入华耶稣会士骆保禄(Giampaolo Gozani, 1657—1732)的7封书简、法国入华耶稣会士孟正气(Jean Domenge, 1689—1735)的11封书简、法国入华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 1689—1759)的8封书简、利玛窦与何大化(Antonio Gouvea, 1592—1677)的调查报告等。有关18世纪之前开封犹太人的资料,基本上已经尽收其中了。

在该领域中,法国神学界的另一位汉学家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沙百里(Jean Charbonnier, 1932—)博士。沙百里曾先后在我国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华人区学习和工作过近三十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1992年,他出版了《中国基督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笔者与郑德弟合译的中译本)一书。大凡国内外研究中国基督徒史的著作,都侧重于研究基督教传播史。沙百里在此书中却另辟蹊径,重点研究基督徒本身的历史,即研究自入华耶稣会士们于明末清初开始布道传教以来,传教士与归化的中国从教人的历史。他对于中国基督徒的基本组成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特别是信徒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阐述。正如作者在为该书的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指出的那样,撰写中国基督徒史,重在揭示基督徒们对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参与。当大清帝国的礼法使基督徒们参加科举的行动变得很困难时,注重学习和为其国家服务的许多信徒,都学习了外语并初步学会了近代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他们与改革派联手,为反对陈规陋习而斗争。他们为少女们开办学校,使卫生保健机构倍增,从大医院到偏僻乡村的小诊所,样样俱全。在诸如蒙古那样的偏远地区,他们也从事了大规模的大型发展水利和农业的工程。

五

法国从20世纪70年代起,陆续推出了一套《启蒙时代的中国》丛书,其中的绝大部分是有关入华耶稣会

士与中西文化首次撞击问题的。

这套丛书中的第一卷是1970年出版的《步中国后尘的亨利·贝尔坦(1720—1792)》。该书由雅克·西尔维斯特·德萨西(Jacques de Silvestre de Sacy)著,裴化行作序。无论是本书作者萨西家族,还是传主贝尔坦,都值得我们作一番研究,他们在法国汉学史上举足轻重。雅克·西尔维斯特·德萨西是18—19世纪初叶法国东方学界的代表人物安东尼—伊撒克·西尔维斯特·德萨西(Antoine—Isaac Silvestre de Sacy, 1758—1838)的后裔。老德萨西主要是从事阿拉伯文化研究,长期执掌法兰西学院的阿拉伯学讲座教席,但也对汉学产生过浓厚兴趣。正是在他的关注下,才得以于1814年出版了自1776年开始推出的《中国杂纂》第16卷,也就是最后一卷。也正是在他的关心下,才使法国教授大会于1814—1815年间将汉学纳入法兰西学院的授课日程。当他在黄经局任职时,得到了宋君荣神甫自中国寄回的两部手稿:一部是寄于1753年5月的《中国唐代历史纲要》,另一部是寄于1749年9月27日的《中国纪年志》。拉普拉斯(Laplace)公爵要求他负责刊布这两部论著。老德萨西于是便以此为契机,与当时法国的汉学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 1788—1832)建立了联系,从而也使他成为18—19世纪法国汉学的推动者与鼓吹者。雷慕沙成为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的首位主持人,也得力于老德萨西的鼎力推荐。宋君荣的《中国唐代历史纲要》和《中国纪年志》形成了《中国杂纂》第16卷的主要内容。事实上,老德萨西继承了法国路易十五时代崇拜东方与中国的三大名星们的传统。这三大名星分别是:传教士、企业家、法国东印度公司的代表、长期在印度和中国等地居留的远东大旅行家彼埃·普瓦夫尔(Pierre Poivre, 1719—1786),正是他将胡椒和肉豆蔻等香料树运往法属非洲,进而销售欧洲,从而使法文中的“胡椒”便以其名而命名;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杜尔哥;法国国务部长贝尔坦,曾在二十多年里负责法国政府的农业问题。贝尔坦认为,发现中国对于法国和整个欧洲都至关重要。卷帙浩繁的1774—1776年《中国杂纂》有许多篇章便是出于他与在华耶稣会士们的通信,共达16卷之多。冯秉正(Joseph M. A. de Mailla, 1669—1748)以朱熹《通鉴纲目》为基本线索编译的《中国通史》也曾由他帮助出版。冯秉正为撰写此书共耗时6载,于1739年才寄达法国,他生前始终未能出版此书。直到1777—1785年间,此书才分为12卷陆续出版。贝尔坦以这些渠道而与法国汉学界建立了联系。德萨西在书中介绍了贝尔坦的生平及政治与学术活动,特别介绍了贝尔坦于1793年之前与北京耶稣会士们的学术通信。其中最重要的内

容,则是记述了高类思和杨德望这两个中国人赴法的过程、在法国接受和培养、回国时所接受的对中国的调查任务之提纲等。

这套丛书的第三卷是1977年出版的托马斯·德·博西埃尔(Yves de Thomaz de Bossière)夫人所著的《17—18世纪中国宫廷中的一名比利时官吏:安多传》。据作者声称,她是安多家族的后裔。安多(字平施, Antoine Thomas, 1644—1709)是比利时入华耶稣会士,于1682年莅华,1686—1694年间先后在清宫中出任钦天监监副与监正。在华期间,他目睹了中欧关系史中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两件大事:其一是通过汤若望和龙华民而与利玛窦系统联系起来的南怀仁神甫的逝世,南怀仁获得清朝皇帝特赐的墓地与葬礼,形成了入华耶稣会士们在华地位的一大分水岭。其二是法国五位“国王的数学家”耶稣会士们到达北京,他们后来几乎主导着中国和宫廷中耶稣会士们的活动方向与准则;康熙1692年的著名诏书给予了入华耶稣会士们一种正式承认的地位。该书共分七章,分别介绍了安多在比利时和法国度过的青少年时代(1644—1677)、在葡萄牙科英布拉度过的中年时代(1678—1680)、出发赴华和1680—1685年间在中国澳门的生活、1685—1691年在中国内地生活的初期。在中国内地,安多于1686年根据满文文献编制了中国14个地区的日蚀表;同年,又编制了汉满文的《行星运行表》。南怀仁逝世后,他开始负责审订中国历书,并为此而从事大量的天文观察,从而将中国的天文历法知识传向西方。他首次全面而又详细地测绘了北京及其近郊地区的平面图和城墙图,然后又将这些资料寄往法国。安多在礼仪之争期间,以其护教著作而向西方传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书的最后,讲到了安多在北京宫廷中继南怀仁而出任钦天监监正一事,特别介绍了康熙皇帝与宫中耶稣会士们的关系以及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等问题。

《启蒙时代的中国》丛书第五卷,是《殷弘绪与中国对18世纪欧洲的贡献》一书,作者仍是博西埃尔夫人。法国入华耶稣会士殷弘绪于1699年莅临中国厦门,1741年逝世于北京,主要活动区域是在江西(九江、饶州、南昌、景德镇)和北京。他的贡献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是译注中国经典书籍问题,包括有关创办义学、造福于民、钱币、习俗、对于中国礼仪之争中四项建议的看法、对于《尚书》和《春秋》有关中国人宗教信仰的考释、中国历史、中国传奇方面的著作;其二是作为技术家的殷弘绪,如他有关中国瓷器、丝绸、人造花和珍珠的制造术诸方面的著作;其三是殷弘绪在介绍中医与保健技巧方面所做的工作,如他节译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出版的《长生》一书,对《本草纲目》的节译,特

别是有关《濒湖脉学》的节译、种痘、人参、茶叶等方面的著作；其四是殷弘绪作为植物学家而搜集的某些中国植物、佛手、柿子、扫帚草、樟树、荔枝、柳絮、竹子等，以及有关人参、茶叶和中药片剂方面的著作。殷弘绪将中国的这些国家瑰宝、丰富物产、古老技术和悠久传统科学介绍到欧洲，对于欧洲向现代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博西埃尔夫人的第三部入华耶稣会士传是1994年出版的《张诚传》。张诚(Jean - Francois Gerbillon, 1654—1707)是法国17世纪来华的五位“国王的数学家”耶稣会士之一，于1687年经暹罗(今泰国)而莅华，1707年逝世于北京，曾任法国中国传教区的总会长。他是清朝前期一位地位很高、学术成果最丰和影响最大的入华耶稣会士之一。张诚在华20年，先后8次赴鞑靼地区旅行，曾参与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多次陪康熙皇帝出巡。在书中，作者通过张诚与欧洲通信，分别介绍了他于1690—1700年间在北京的生活，1690—1705年间他与在华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之间维持的友好关系，教皇大使铎罗于1705—1706年出使中国及其与张诚的交往，张诚在北京度过的最后几个月等。并着重指出，耶稣会士们在北京皇宫中基本上是不间断地存在了近两个世纪，在中国总共存在了两个多世纪，教皇克莱芒十四世错误地于1773年7月21日解散了耶稣会，从而结束了他们在中国各地的活动，根本没有考虑耶稣会士们在那里冒着生命危险而作出的努力、坚持的信仰与勇气、经受的苦难和繁忙的外交活动，从而造成了中西关系中的一大悲剧。

法国有关入华耶稣会士的另外一部传记是叶利世夫人(Danielle Elisseeff - Poisle)于1978年出版的《弗雷烈传：18世纪一名人文主义者的中国观》的博士论文。尼古拉·弗雷烈(Nicolas Freret, 1688—1749)是法国18世纪学术界一位“中国热”风潮的推动者，是法国金石和美学科学院的常务秘书。他根据入华耶稣会士们(诸如宋君荣等人)向他提供的资料，曾企图与傅尔蒙联手，探索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国纪年，学习中国语言，特别是企图编写一部法汉词典和一部汉语语法书。他们还试图利用由耶稣会士们派往法国的中国福建从教人黄嘉略(Arcade Huang)来完成这一切。公允地说，弗雷烈既非神学家，亦非空论家，而是继承了17世纪哲学家们的传统，更为关心诠释《圣经》中的历史事实。他因此而更受由耶稣会士们介绍的中国古老历史的影响。但从后来的结局看，弗雷烈本人并未从其对中国的研究中获得多大的名声，而其同事傅尔蒙和学生德经(Joseph de Guignes)反倒成为名噪一时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叶利世夫夫人于1985年还出版了一本以黄嘉略、弗雷烈、傅尔蒙和路易十四为中心内容的小说体裁作品《我是黄嘉略：太阳王的中文翻译》。此书虽然学术价值不高，可读性却很强，完全以自述体回忆录的纪实方式，以第一人称介绍了黄嘉略在法国王宫以及与学术界“中国热”名流们的交往关系。叶夫人将深藏档案馆二百五十余年的档案公布于世，揭示了中法关系在18世纪的一段秘闻，应该说是一大功德。

1992年，法国出版了埃狄纳·迪尔科内(Etienne Durconet)的一部《利玛窦传》。作者开门见山地指出，1982年，东西方利用利玛窦入华400周年之际，对利氏响起了一片赞扬声，他被称为“学者”、“人文主义者”、“汉学之父”、“中国教区的缔造人”、“适应政策的先驱”等等，溢美之词不胜枚举；他成了近代世界范围内最大的思想家之一，是中欧文明之间的一道真正桥梁。但人们似乎忘记了，利氏首先是作为传教士而于1582—1610年在华滞留并积极活动的。他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技巧、神奇的记法、交友的手段，无不因其推动中国福音化事业之主体思想的支配，一切都是推行和维护其宗教信仰的“借口”。他在一切交往与关系中，都不会忽略这一点。至于其“适应”政策，它与今天宗教信仰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同出一辙。利氏从未真心实意地落实过真正的“适应”政策，而仅仅是一种“创始”；其文化“适应”尝试，仅限于宗教信仰的某些很有限的方面，如上帝的存在与灵魂的不死性等。由于他坚信在中国不可能实现众多人的归化，所以才采取“适应政策”。利玛窦的真正才能，表现在他对待儒学的态度与文士儒生们的交往中。他后期一方面与释老二宗为敌，另一方面又清楚地认识到，儒学拥有丰厚遗产并具有表现基督教某些信仰的能力。利玛窦在与儒家士大夫打交道时，能获得最大成功之原因，并非是其《天主实义》，而是他有关伦理哲学的论著。利氏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传播福音，首先不应通过布道，而是应通过“关系”交友才能实现，所以，他于其一切行动中都将“交友”一种重要地位。但无论如何，与16世纪的入华耶稣会士们相比，利玛窦总算是实现了一种革新。他采取的方针是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首先要使自己成为“中国人”(适应中国社会、学习中国语言、沿用中国习俗、了解中国人的思想等)。他在这方面确为一名真正的先驱。方济各·沙勿略早就预感到了这些必要性，利玛窦最终将它们落实了。当然，利玛窦也受时代的限制，如他在注重对儒学友善时，却粗暴地关闭了与释老建立联系的大门，而罗明坚却始终坚信应对佛教一方寄托更多的希望。利玛窦因此而失去了与中国释老宗教对话的机会，从而很难全面又深刻地理解中国人的内心

世界,最终也为“适应政策”设置了障碍。“适应”,并非是个别传教士的行为。由于在利氏的一种创新措施和具体实施条件之间存在着差距,所以便造成了一种紧张局面,从而使利玛窦的计划很难如愿以偿地实施。总之,利玛窦在华所面对的是中国明帝国在政治上的大一统和经济上的闭关自守、儒释道三教并立的社会背景,又恰逢世界性大转变和欧洲向世界范围内开放的时代,从而造成了他向欧洲介绍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之机遇。这部《利玛窦传》共分四章。第一章是《佛教徒中的一名出家人》,主要是介绍利玛窦早期以“洋和尚”的身份在肇庆的传教、其布道的方法是与中国人打交道时先成为中国人、天主十诫、最早的归化、有德有识的外国人、罗明坚神甫的教理问答书、宣扬教理的对话、派遣教廷大使的必要性、在韶州改变布道方向和最终发现儒教。作者认为,利玛窦在韶州与佛教决裂而转向儒教,是他能在中学西渐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关键。第二章是《儒林中的一文人》,以利玛窦奠定传信基础、朱熹的理学、利玛窦的儒学、《交友论》、利氏记法、南京的大辩论和北京的主教等为内容,详细地介绍了“西儒”利玛窦与中国儒生结合的过程。第三章是全文译介利玛窦的中文名著《天主实义》八篇。作者首先认为这是一部护教著作,接着追述了其写作与刊行过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天主实义》本为一部试图使不同文化互相适应的著作。第四章是讲述利玛窦在华的《最后年代》,依次谈到了利玛窦在其《基督教教理问答书》、《二十五言》和《畸人十篇》中的儒教观,以及徐光启对利玛窦的影响。作者在结语中认为,正是利玛窦的在华传教政策,才造成了中学西渐的局面,从而造成了利氏在中西双方均受褒扬的结果。

法国入华耶稣会士的另一部传记性作品,是1970年由勒内·西蒙(René Simon)整理编辑出版,并由荣振华编制年谱和著作目录的题为《宋君荣北京书简集》的巨著,全书共1020页,发表了宋君荣342封详加注释的书简,大都是首次刊布。法国入华耶稣会士宋君荣于1722年来华,曾任法国北京传教区的会长,也曾费大力气使镇国公苏努一家归化。他长期与法国的弗雷烈和德斯里尔(Deslile)保持通信关系。1745年,他筹建法国传教区北京天文台,1759年7月24日逝世于北京。宋君荣一生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先后翻译过《周易》、《尚书》、《诗经》和《礼记》等中国经典,著有《中国历史纪年》、《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大唐史纲》和《成吉思汗与蒙古》等传世名著,尤其在天文地理方面的研究引人注目。宋君荣的这批大多为未刊的书简,向西方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历史(纪年)、天文(日蚀)、地理(测绘地图)、民族(犹太人)、政治、风俗等方面的知识。

李明(Le Comte, 1655—1728)神甫是1687年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他于1688年2月7日到达北京,作为天文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地理学家而留在清朝宫中。他后来又到过绛州(治今山西新绛)、西安、广州和厦门进行活动。他在华期间,也正是礼仪之争在欧洲发展到白热化的时代。为了替入华耶稣会士们辩护,同时也为了忠实地反映中国人的政治、风俗、宗教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他于1696—1698年写成了一部三卷本的护教性名著《中国现势新志》。此书以书简的形式抨击了当时那些敌视中国的人,捍卫了耶稣会士们的立场并反映了中国的真实情况,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法国学者图布勒-布耶尔(F. Touboul - Bouyeur)于1990年重版了此书,并于卷首写了很长的序言,详细地介绍了李明的生平、其书的出版过程以及他为中学西渐所作的贡献。

由入华耶稣会士金尼阁(N. Trigault, 1517—1628)翻译整理的利玛窦神甫的回忆录《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译本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笔者认为不太确切。因为这是一部史书,并非是随笔札记),自1615年出版以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并多次再版,其中包括多种法文版。法国学者贝西埃尔(G. Bossière)重新用拉丁文翻译了该书,于1978年在巴黎出版。鉴于这部十分重要的著作已有中译本,笔者在此不赘。它是有关早期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和撞击的奠基著作之一。

六

人们一提到音乐,往往只会想到西洋音乐传入中国及其影响问题,而对于中国音乐传入西方则所知甚少。事实上,久负“礼乐之邦”盛名的中国,在音乐、戏剧、乐器、乐理及其有关论著方面,也曾为世界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于1974年出版了原籍为中国广东的法国华裔女学者陈艳霞的《华乐西传法兰西》(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了笔者的中译本)一书,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

《华乐西传法兰西》共分五章。第一章是西方于18世纪之前有关中国音乐的最早论述。中国古乐通过鞑罗思(俄罗斯)人的媒介作用和马可·波罗等西方旅行家的游记而西传,元朝军队的军乐在13—14世纪时便为西方所熟知。最令西方感兴趣的是,中国已将“乐”纳入到其政府法律和道德礼仪的范畴中了。在白晋神甫于1716年在欧洲掀起“中国热”之前,勒尼雅尔(Regnard)就于1692年在意大利排演了一场名为《中国人》的戏剧,其乐曲并没有多大的中国特色。勒萨热(Le Sage)分别于1713年、1723年和1729年在圣-日耳曼的集市上演出了《中国皇帝的丑角》、《中国公主》和《卷

毛犬、丑角、宝塔和医生)等所谓有关中国的喜剧。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dé Prémare, 1661—1736)最早曾翻译过中国的某些田园牧歌和天主教主祈经唱诗。特别是他根据《元人百种曲》而编辑的《赵氏孤儿》剧本,导致了伏尔泰那部名声赫赫的《中国孤儿》的问世。杜赫德(Du Halde)神甫 1735 年于《中华帝国全志》中发表了耶稣会士们对中国音乐的论述,首次介绍了一曲《柳叶锦》,并对中国的乐器作了初步描述。普雷沃(Prévost)修道院院长在 1784 年的《游记通史》中,也发表过有关中国音乐的论著。波希米亚入华耶稣会士严嘉乐(Charles Slawiczek)具有渊博的音乐知识,1735 年在致巴耶的书简中,详细地记述了中国的音乐问题。

该书第二章是讲钱德明神甫对李光地《古乐经传》的译本。对中国音乐西传欧洲作出最大贡献的人是钱德明神甫。他于 1754 年将李光地的《古乐经传》的乐理著作译成法文并寄回法国出版,导致法国各种书籍刊物陆续转载并挑起了许多学者之间纠缠不休的辩论和五花八门的评论。其中,特别著名的书评分别是由拉莫(Rameau, 1760 年)、阿尔诺(Arnaud, 1767 年)、卢梭(Rousseau, 1768 年)、鲁西埃(Roussier, 1770 年)、德·拉博尔德(De La Borde, 1780 年)、格鲁贤(Grossier, 1785 和 1820 年)、甘格纳(Ginquen, 1791 年左右)等人所作。钱德明神甫后来又对这些人的批评作了自我辩护。一时间,诸家纷注,众说纷纭,十分热闹。这是中国音乐理论著作最早在欧洲的广泛传播,从而也形成了当时欧洲“中国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章是《钱德明神甫的论著〈中国古今音乐篇〉》。钱德明神甫除了翻译李光地的《古乐经传》之外,还于 1776—1779 年间写了一部有关中国音乐的论著,寄到法国后再度掀起轩然大波。书中在详细地介绍了中国音乐史之后,又对中国的乐器(8 种响体和 8

种乐器)、律准,古代中国人演奏五弦琴和七弦琴的方式,中国的音乐体系、律吕、律的相生法、三分损益法、七律、谐音等,都作了准确程度不同的论述。

第四章是《钱德明神甫有关中国音乐的各种著作与资料》。钱德明神甫除了这两部译著和论著之外,还搜集了大量有关中国音乐的文献、乐谱和乐器样品,翻译了中国古代某些与音乐有关的舞蹈著作,从而向欧洲提供了有关中国音乐的宝贵资料。他于 1770—1779 年写成了《〈中国古今音乐篇〉补遗》,1779—1792 年写成了《平定金川的鞞鞞—满族赞歌》,1788—1789 年写成有关舞蹈和《股肱歌》的两篇论文,1779 年搜集了一组中国乐曲;从 1790 年起,他还将一批中国乐器运往法国。这一切,都是华乐西传法兰西的重要途径。

第五章是《18 世纪下半叶有关中国音乐的其他著作》。钱德明的著作不仅具有追述既往的意义,更重要的是首次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固有的独特音乐体系,打破了当时欧洲盛行的有关中国乐理衍出于埃及的神话。除了钱德明神甫外,还有某些入华耶稣会士和学者们也为中国音乐的西传作出过贡献。韩国英(P. - M. Cibot, 1728—1780)于 1780 年写了一部《论中国的磬》,载《中国杂纂》第 6 卷中;德经(De Guignes)于 1784—1801 年在其《游记》中发表了《天子万年》的中国乐曲;英使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及其随员巴罗(Barrow)于 1789—1824 年入华游记中也介绍过中国音乐,特别是介绍了《茉莉花》的歌曲和六弦琴的乐曲,此外还介绍了一支纤夫曲。

总之,中国音乐在 18 世纪的法国,虽不及中国造型艺术、古玩文物和孔子的伦理格言那样普遍传播,或者是热极一时,但中国的礼乐文明,也曾让富有浪漫色彩的法兰西人所陶醉,成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与撞击的一个重要领域。

Research on the First Cultural Impa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French Sinology

GENG Sheng

(Institute of Histor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It was the first cultural impa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1618 century. In the impact and the exchange, the Catholic missionaries in which the Jesuits in China as a main part were medium. Both in the spread of Chinese Learning to the West and the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to China, they made a lot of beneficial work that any body couldn't replace them. Their missionary task was ultimately unsuccessful and they gained little. However, they achieved great successes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 especially on the side of philosophy, historiography, economy, ethic, politics, language and technolog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ey got more results in the spread of Chinese Learning to the West than in the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to China. The paper comments on the studies of French Sinologists during twenty years.

Key Words: first cultural impa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16—18 century; French sinology

[责任编辑、校对:田卫平]

法国汉学界对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的研究(上)

作者: [耿昇](#)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100732](#)
刊名: [河北学刊](#) PKU CSSCI
英文刊名: [HEBEI ACADEMIC JOURNAL](#)
年, 卷(期): 2003, 23(4)
被引用次数: 1次

相似文献(3条)

1. 期刊论文 [耿昇](#) 法国汉学界对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的研究(下) -[河北学刊](#)2004, 24(2)

明末清初的16-18世纪,是中西两种文化首次撞击的时代.这次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流媒介,是以入华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他们无论是在中学西渐方面,还是在西学东渐领域中,都做了许多有益的、他人无法取代的工作.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课题,法国汉学界在该领域中始终居领先地位.本文对法国汉学界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了鸟瞰式评介.

2. 期刊论文 [耿昇](#).[GENG Shen](#) [从基督宗教的第3次入华高潮到西方早期中国观的形成](#)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2)

基督宗教的首次入华高潮是唐代的景教徒,第2次高潮是元代的方济各会士,第3次入华高潮则是明末清初的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多个修会的传教士.入华耶稣会士来自欧洲几乎所有国家,但以南中欧拉丁文化的国家为主.他们的社会出身一般较高贵,故来华后走上层路线,广交上至朝廷,下至文人儒士,推行中国文化“适应政策”.他们在传教方面收获不大,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却功不可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对于中学西渐的贡献,还要大于其对西学东渐的贡献.他们的书简、报告和著述,促进了西方早期的中国观的形成.

3. 学位论文 [刘亚轩](#) [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研究](#) 2009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明末清初是一个辉煌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众多西方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和桥梁,使中西双方的认识和沟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此,国内外的学术界已经有诸多论著.可是,对来华的非耶稣会传教士为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我们的研究则明显滞后.关于清初来华的度劳会士马国贤的研究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通过本文对马国贤深入细致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马国贤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人物,他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马国贤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 1、马国贤的中国观对欧洲18世纪中国热的降温起了重要的作用.
- 2、马国贤的回忆录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大门,为学者们研究康熙时的中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
- 3、在中西美术交流史上,马国贤第一次把西方的铜版画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以往中国只是制作木版画的传统.马国贤制作的铜版画《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促进了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中国园林热.
- 4、马国贤为研究中国礼仪之争提供了更多更珍贵的材料.在礼仪之争中,欧洲社会的很多人士不再相信入华耶稣会士的报告.马国贤的报告恰好在此时出现,因而对当时的欧洲影响更大.
- 5、在中国留学史上,马国贤在其家乡那不勒斯创办的中国学院,是欧洲最早的中国人留学中心.中国学院体现了马国贤与利玛窦的适应路线不同的另外一种传教方法,在清朝厉行禁教时期,为中国的传教事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

马国贤的个案研究表明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来华的传教士无论何门何派,无论其主观立场如何,都不自觉地充当了文化交流的媒介和桥梁,也说明我们急需加强对在华的非耶稣会士的研究,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揭示明末清初这场大规模文化交流的全貌.

引证文献(1条)

1. [何谐](#) 法国耶稣会士的中国研究及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期刊论文]-[攀枝花学院学报\(综合版\)](#) 2007(2)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bxk200304040.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9d05849e-1c49-4910-86f5-9e4d00857965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